



每当时代变幻时,老字号企业总要主动或被动地面对新生。在未知的结局到来之前,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可能的精彩。同仁堂的公私合营,是这个时代的先声,亦是今天的历史。

同仁堂穿越时空

■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作为目前惟一仍留在同仁堂工作的乐家后人,乐松生努力回忆了之后说:“没有了没有了,都已经很透明了。”

现年39岁的乐松生是乐家第十五代,“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里除了我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堂工作。”

时光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同仁堂面对的是一次重大变迁。

那一年的北京城,有个名字可以说是街知巷闻。他就是率领同仁堂完成了公私合营的乐松生。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同仁堂的命运有着特殊的昭示性。它的成功公私合营不仅代表着当时的潮流,也让乐松生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明星。

解放

39岁的乐松生在公元1669年创办同仁堂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家药店后来可以经历那么多朝代。自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后,同仁堂独办官药188年,历经了300多年的光阴。

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解放。同仁堂的乐家老铺里,出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伙计们成立了工会。在这个隶属于“北京市国药工会”的同仁堂工会里,伙计们开始要和老东家平起平坐了。

不久,职工们提出“要和资方谈判”。这在乐家看来,算得上是“古今奇闻”。乐家接连派出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作为“资方代表”,但都和职工谈崩了。

见此情景,乐家各房疑虑重重、议论纷纷。就在他们认为谈判无望时,工会提出了一个方案:请乐松生回来代表资方谈判。

“那就让松生试试吧,别人反正不是玩不转了,就看看他有没有金刚钻吧。”这是乐家一位长者的声音。

作为第十三代传人的乐松生时年41岁,是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兼管着天津北京两地党务。当时身在天津的乐松生急忙往北京赶,一想到职工指名道姓要他去谈判,心里就七上八下起来,担心应付不了职工闹事。从天津到北京本不长的一段路程,经他一番左思右想,竟觉得比往日远了好几倍。

在与职工的交流中,乐松生看到职工为同仁堂的现状和前途操心,他受到了震动。从此,他对“工人当家做主”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双方的沟通很顺利,谈判很快就取得了进展,劳资双方很快地达成协议。

1949年10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同仁堂工会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联欢晚会,乐松生作为资方代表被特邀参加,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联欢会其实还包括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推选同仁堂经理。

转折

1949年10月4日,在同仁堂职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联欢晚会上,乐松生唱了一段京剧《甘露寺》名段《劝千岁杀字休

出口》。当他畅快淋漓地唱完“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作为同仁堂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他成为了解放后第一位由职工推选出来的同仁堂经理。

在那晚之前,作为资方代表的乐松生多少有些忐忑和迷茫,当职工宣布推选结果的那一刻,乐松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乐松生在职工热烈的掌声中冷静下来,他终于相信自己这个东家不但被职工所接纳,而且成了他们拥护的经理,成为了他们的“自己人”。

此后的日子里,乐松生放下了忐忑和忧虑,热情地融入到新社会的大

以后同仁堂究竟会怎样?乐松生心里没有底。与此同时,乐家各房业大人多,内部矛盾重重,这也让乐松生不堪其扰。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当时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同仁堂代表性大,影响面广,必须从统战政策的高度加以重视,一切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必须经市地方工业局局长王甦和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商定,在他们两位的主持下开展工作。乐松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仁堂公私合营工作的方案,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和同仁堂所在地的区委、区工会研究提出,又报请市委统战部批准后,正式开始执行。

同仁堂的公私合营,对国药业及其他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北京市扩展公私合营起到示范作用。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工商业者座谈会上,乐松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述他所看到的事实: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才有出路。

1955年初,北京市市长彭真亲临同仁堂会见了乐松生,对他带头实行合营和合营后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不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乐松生,毛主席亲切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的业务情况,鼓励他要为祖国医药事业



解放初的同仁堂

潮中,他逐渐读懂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选择了同仁堂等几家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首先进行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

消息传来,同仁堂乐家又激起了巨大的震荡。

乐松生耐心地到乐家各房面前征询“公私合营”的意见。面对着各种抵触的声音,乐松生决心要申请公私合营,彻底告别伙计被迫改姓的旧同仁堂,但在此之前,他要做的还是获得乐家其他各房的同意,而这绝非易事。乐松生分析利弊,讲明道理,不断向乐家股东们做说服工作。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级干部和乐家亲属,配合乐松生和各房沟通、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乐松生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各房的赞同。

1954年,乐松生正式代表同仁堂的资方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这是同仁堂历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乐松生人生的重大转折。

合营

乐松生提交公私合营的申请之时,除了饱满的热情,也带着些许忧心。

1954年7月28日,北京市派工作组到同仁堂进行公私合营的筹备工作,作为资方代表,乐松生积极协助工作组,召开职工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采取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解释同仁堂合营的步骤措施,指明合营后的前景,消除各种疑虑。他以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影响带动了股东和全店职工为合营作贡献,保证了合营工作的顺利进行。

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正式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确定企业领导人职务,乐松生任经理,江涌波、乐益卿、刘璟任副经理。乐家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的共有36人。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主管,总投资二十五万,同仁堂的私人资本定为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二角五分。

供奉御药的同仁堂在经历了数百个春秋后,终于成了新型的公私合营企业。

多做贡献,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这一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同仁堂合营后,改变了原家族企业封建性的生产关系,焕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清产核资、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技术革新等一系列工作,同仁堂有了更快的发展,逐步显示出合营的优越性。

同仁堂公私合营的成功,还推动了北京全行业的改造,给其它老字号企业以积极的影响。

1956年1月4日,在乐松生带动下,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国药业的带领下,许多行业的资本家也纷纷提出了申请。1月8日,包括国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800多家商店同时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下来。

相关

公私合营中的中华老字号

■ 齐雯/文

冠生园

由上海民族资本家冼冠生1918年创立,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名牌老字号企业。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冠生园”和“大白兔”。1956年,上海冠生园总店进行公私合营,从此成为国有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冠生园分店,也均被当地政府收编改造。

全聚德

由河北冀县杨家寨人杨寿山1864年创立。1952年,杨家第四代传人难以维持企业发展,将全聚德的歇业请求交到了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像全聚德这样的品牌企业必须保留,政府应该给予支

持。就这样,北京市政府在1952年对全聚德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政府持有50%的股份。

稻香村

苏州稻香村始创于清代乾隆38年(1773年),特色糕点为苏式月饼。北京稻香村始创于光绪21年(1895年)。1953年底开始,大量食品店关门,稻香村幸运地保留了下来。1956年1月,苏州稻香村和北京稻香村正式公私合营。

九芝堂

由江苏吴县人劳澄1650年(清顺治七年)在长沙创建。1956年1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九芝堂第一批敲锣打鼓开始公私合营,并改名“劳九芝堂药店总店”,劳端生出任资方副经理。4月,位于长沙坡子街的铺

面改为“公私合营九芝制药厂门市部”。

瑞蚨祥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朝光绪19年(1893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为旧京城“八大祥”之首。1954年,瑞蚨祥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了公私合营。

内联升

始建于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以生产经营传统产品千层底布鞋而闻名中外。1953年,时值内联升创办100周年之际,企业开始了公私合营改造。1953年国家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内联升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公私合营之后,一直以“打坐轿人主意”的内联升全面开始“为工农兵服务”。

东来顺

东来顺是位名叫德山的回民创办于1903年。解放时,东来顺的涮羊肉早已驰名京城。1955年,东来顺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公私合营。此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民族事业,发扬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传统,对东来顺的发展做了大力的扶持和帮助。

中国照相馆

1937年,由江苏武进人吴建屏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照相馆把服务对象转向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首创礼服出租和鲜花专供等服务项目,生意十分兴隆。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后,响应周总理“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号召,迁往北京。周总理亲自为其选定店址。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

背景

得到人民信任是钱买不到的



荣毅仁

■ 马铭/文

1956年中国的关键词是“公私合营”。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就在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的5天之后,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许多资本家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在队伍行进过程中,有一位资本家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这位资本家就是时年40岁的荣毅仁。他是当时上海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老板。

当时,在公私合营进程中,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南方的领头者则是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荣毅仁当时在全国8座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1954年,荣毅仁将上海的各家荣氏工厂重新组合,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所有荣氏企业已完成公私合营的改造,荣毅仁更是四处现身说法、宣传政策,其“红色资本家”的名号从此不胫而走。

1月10日,毛泽东南下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当时他风趣地对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视察结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新华社记者问荣毅仁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保证了。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 and 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1957年后,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

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74%上升到82%。同时,农村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展开。1955年,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5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占全国总农户的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表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前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管理。

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

在热火朝天的1956年,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2月,全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营的优越性逐步展现,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